

“东方红一号”升空之际的文人唱和

1970年4月24日,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从此进入太空时代。喜讯传来,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欢快的心情。其中,多位学者以诗歌形式表达内心的喜悦,赞美新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自豪、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而歌唱。

俞平伯与荒芜诗歌唱和

卫星发射后,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媒体和地方报纸上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科技人员编制的卫星某天《飞经祖国各地的时间表》,以便各地群众据此在天空中寻找经过本地上空

的卫星轨迹。
1970年5月3日,身在河南息县东集镇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所干校的俞平伯,就感受到了这刻。他在给在天津工作的儿子俞润民的信中说,4月29日那天,“晚8时20分左右,卫星飞过这里上空,一极小之星,在南天由西而东。我瞻望未得见,汝母则稍微瞥见之,可谓难得之机会。据云乃极小星星瞬息掠过,无怪我之不得见也。”据1970年5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的航天代表说,当天晚上钱学森也曾按照他抄下来的时间表观看卫星。

赶上这么一件国家大事,作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文人俞平伯岂能无诗?俞平伯在给儿子的信中,抄录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只争朝夕’成功

速,还是云程第一遭。主席宏观欣实现,风流人物数今朝。”

这首诗突出了新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中的首创。诗中还两处引用毛泽东诗句,高歌中国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建设速度,“还是云程第一遭”,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研制的航天器首次进入太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宏伟规划。

俞平伯的诗,在文艺方面确如作者本人之论,似有“不佳”之处。但作为政治诗、时事诗,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证史功能,也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反映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其实,最先读到这两首诗的,并不是俞平伯家人,而是他的好友荒芜。著名作家、翻译家、诗人荒芜本姓李,故在俞平伯给家人的书信中,经常将其简称为一个“李”字。

俞平伯在信中谈到二人经常有诗歌唱和,并特地说“李赋诗咏卫星”。李荒芜的诗也是一首七绝:“一星高照绕青空,乐曲风传遍宇中。从此和平有保障,万邦齐仰太阳红。”李诗起首两句,出手不俗,诗中有画,画中有乐,写得活生生、洒洒脱脱。后两句,收有气势,诗人联想到发射卫星这一壮举,使国家有了“和平保障”,实现了“万邦齐仰”的效果,以诗阐理,写出了观点和见识。可以说,此诗不失为政治性与艺术性较好结合的一部作品。

何其芳激动“赋诗”追卫星

正当俞平伯和荒芜二人唱酬、歌

咏卫星上天之际,同在一地的诗人何其芳,恐怕也还刚刚由其新角色中转换过来。何其芳是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著名诗人,在干校的任务是养猪。

东方红卫星的上天,也震动了这位正在养猪的诗人,何其芳写下了新诗《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该诗长达250余字,共7个小节。在第二小节之前,诗人首先引入《东方红》歌曲,为该诗主题做了铺垫:“在地球的各个地方,只要有人民,有革命,早就用各种语言,响起了《东方红》的歌声。”

这首诗的精华更可以从第六个小节中看出:“在祖国的田野间劳动,我的心追随卫星,以莫大的欢欣和速度,环绕地球飞奔。”中国人民的科技创造,广大科技人员几十年的努力,化作了一曲“仙乐”,由天上传向地球,联通了天地,贯穿了人我。最后,诗人的心,带着莫大的欢欣,和着飞快的速度,随卫星一起飞向太空。在诗人的笔下,卫星就是党领导的事业的成功,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诗人“心追卫星”,自然就是追随党,就是追随人民,就是追随历史前进的脚步。诗的最后,表达了诗人的良好愿望:“祝祖国更繁荣、富强!”

何其芳的这首《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来被收进多种出版物中,作为经典之作流传了下来。诗中“我的心追随卫星,以莫大的欢欣和速度,环绕地球飞奔”也成为名句。每当读到此诗,人们的心情一定也和诗人一样,心随星转,奔向太空,奔向那遥远的星辰大海……

沈从文文化“史诗”记卫星

在欢庆卫星上天的那些日子里,著名文史学者沈从文也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满心的欣喜

之中。1970年4月30日,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沈从文在给夫人张兆和的信中说:“在这里住下,除从收音机知道一点国内外大事和天气预报,就只有一份《人民日报》可看。人造卫星上天从收音机里传出时,村子里远处不久也响起了锣鼓,恰恰和住昆明听说日本投降情形,记得有些人在桃源拿搪瓷脸盆当锣打,犹如昨天事情。”沈从文多次将卫星写进了他的诗中。

沈从文先是在一首《挖砂场上红五连》的诗中,赞扬红五连战士人人不怕苦累拼命干活,还谈到了连长兼司务长的诗人李季“久停诗笔抓思想”的情形。在诗的最后特别突出刚刚上天的人造卫星:“新兴事物难尽言,壮丽宏图非空想。试看天上红卫星,七亿人民齐拍掌。”这首诗的主题虽然不是歌颂人造卫星,而是描写劳动活动中的一个连队见闻,但在卫星上天的这个大背景下,诗人自然地就将其写进了诗中。

5月,沈从文写了一首五言诗《红卫星上天》,1100多字。单看标题,人们容易把它误会成一首时事应景诗,其实不然。诗人是以卫星上天这一重大科技成果为引子,全面系统叙述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恢宏历史,从上古一直写到现代,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讴歌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并从卫星上天引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上世纪70年代,诗人们无论际遇如何,仍是心逐苍穹,仰望星空,去寻找天上那颗第一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红卫星”。用心谱写了曲曲红星赞歌;运思挖掘出卫星上天的历史意蕴,为后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美篇佳作,反映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据《团结报》宋泽滨/文

川中奇子刘师亮写“杂碎”骂军阀

四川著名的奇才子刘师亮攻读过八股文,崇拜过康、梁,但他后来赖以谋生的职业,不过是在成都开茶馆、开澡堂、开电影院。业余间办了一本叫《师亮随刊》的杂志。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刘师亮发表了众多针砭时弊的“杂碎”——之所以说是杂碎,是因为这些东西相当零散,有对联,有对话,有油诗,却少有系统的成篇文章。这些“杂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刘师亮以川人独有的幽默诙谐,对时局和达官显贵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

军阀杨森统治成都期间,规定凡是家里有厕所的人家,都得交纳“厕所捐”。刘师亮怒而撰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有一个川军将领为筹措军饷,下令将千年名刹大慈寺内的铜制佛像尽皆化作铜元,唯余全寺最大的一尊阿弥陀佛像没敢动。刘师亮撰联讽刺道:“两眼瞪着天,准备今日淋暴雨;双手捏把汗,谨防他日化铜元。”四川商会会长樊孔周得罪了军阀刘存厚,刘存厚一怒之下,派刺客将其枪杀。人人皆知此系刘存厚所为,但在一个崇尚暴力的军阀面前,民众只能敢怒不敢言。孰料,

不怕惹祸的刘师亮竟为樊孔周写了一副挽联:“樊孔周周身是孔,刘存厚厚脸犹存。”亲朋好友都替刘师亮捏了把汗,所幸刘存厚终究未敢找刘师亮的麻烦。

四川势力最大的军阀当属刘湘,此人后来搭上蒋介石这条船,成为众多军阀中统一全川者。但无论哪个军阀的获胜与统一,都意味着民众血泪中的呼号与挣扎。刘湘曾买回一艘军舰,命名为“巴渝舰”,游弋于重庆到万县的长江江面上。当时,其他军阀运兵还是用木船,刘湘对此很得意。刘师亮却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对刘湘的军舰挖苦不已:“都督有艘巴渝舰,由渝到万才十天。不是沿江滩险陡,几乎胜过柏木船。寄语沿江船夫子,撞烂军舰要赔钱。”

刘湘死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公祭,刘师亮也很应景地送了一副挽联,挽联云:“刘军长千古,中华民国万岁。”见者均感诧异:上联的刘军长与下联的中华民国三个字对四个字,怎么对得起呢?怪而问之,刘师亮一语双关地说:是啊,刘军长的确对不起中华民国。

据《同舟共进》聂作平/文

